

中国协商政治 发生与演变逻辑

黄福寿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协商政治 发生与演变逻辑

XINSHIJI

XINSHIJI

黄福寿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协商政治发生与演变逻辑/黄福寿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760 - 6

I. 中... II. 黄... III. 政治制度—研究—中国 IV. 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9447 号

责任编辑 罗 湘

封面设计 迪 垒

中国协商政治发生与演变逻辑

黄福寿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19,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760 - 6/D · 1584

定价 25.00 元

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1949年人民政协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实现这一制度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诞生。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奋斗的伟大成果,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别为基础组成的,是我国所有合法政党参加并以本党派名义在其中活动的多党合作组织,是实现协商式民主的重要机构和重要形式。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为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执政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为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为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政协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断与时俱进,为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继承和发展了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人民政协的思想理论,提出许多重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开展人民政协工作的行动指南。200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积极组织并大力推动关于人民政协的理论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2006年12月,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成立,贾庆林同志在成

立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成立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组织广大政协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研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探索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规律，对于更好地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和推动新世纪新阶段的人民政协工作，开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该说，近几年关于人民政协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总体看，目前对人民政协理论的系统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尤其是从人民政协实践对理论的需求看，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推进。因此，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如何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研究人民政协的历史和实践，推动人民政协理论不断向前发展，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成了十分紧迫的现实课题。我们应该既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不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和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模式；既科学总结人民政协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特点，又大胆探索人民政协发展规律，深化人民政协基础理论研究。

本书作者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在研究人民政协的时候，把视角延展到清末的谘议局和资政院、民国时期的国民参政会和旧政协，把他们表述为中国协商政治的不同历史形态，并以此为历史背景和视角，以上海市政协为研究对象，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协商政治形态及其演变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以揭示中国协商政治运行的基本过程、中国协商政治形态演变的历史逻辑，以及中国协商政治形态演变的主要原因，并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路径。应该说，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对深化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是作者既肯定了西方协商政治对于中国协商政治的比照和借鉴价值，又强调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和现实价值，这拓展了我们对“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理解：既要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要借鉴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诚如作者所言，由于人民政协理论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可以直接

借鉴的资料不多,因此,尽管作者作了主观努力,但对一些问题的分析还有不够成熟之处,有些观点也需要进一步探讨。今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希望更多的理论工作者来研究相关课题,以推进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

周铁农

2009.6.19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

目 录

序 周铁农 1

导 论 中国协商政治形态缘起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路径选择 1

第二节 中国协商政治形态缘起 4

上篇 历史实践:近现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基本形态

第一章 谘议局和资政院:皇权危机背景下的政治选择 11

第一节 谘议局的基本架构和功能 12

第二节 资政院的制度与功能 21

第二章 国民参政会:民族危机时期的政治安排 29

第一节 国民参政会的制度和参政员 30

第二节 国民参政会的功能和作用 40

第三章 旧政协:和平民主建国争论声中的政治插曲 45

第一节 旧政协召开的办法及会员名单 45

第二节 旧政协决议案及历史作用 51

第四章 新政协:以建人民民主国家为宗旨的政治设计 57

第一节 新政协的筹备与制度安排 57

第二节 新政协的基本职能和作用 68

下篇 个案研究:中国地方协商政治理论与实践

第五章 中国地方(上海)协商政治历史形态	77
第一节 政权巩固时期的市协商委员会 (1949—1955)	77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时期的市政协 (1955—1977)	91
第三节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市政协 (1977—1999)	106
第六章 地方协商政治组织架构下的各党派与各阶层	132
第一节 协商政治过程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	134
第二节 协商政治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民主党派	148
第三节 协商政治过程的重要角色——其他界别	161
第七章 地方协商政治形态演变的主要原因	175
第一节 协商政治形态演变的根本原因 ——经济社会基础的变化	176
第二节 协商政治形态演变的直接动因 ——应对内外部挑战	198
结 语 中国协商政治形态演变的历史逻辑	210
参考文献	217
后 记	232

导论 中国协商政治形态缘起

作为民主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协商政治形态,虽然不是从中国的传统社会政治资源中直接生发出来的,但却是中国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等交互作用的结果,既体现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求,又反映了西方政治的影响和示范效应。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路径选择

鸦片战争以前,尤其是十六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欧或日本那种纯粹的封建社会,不管在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或者是思想文化方面,都有很大差别。

一、多元的经济基础

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商周两代的社会性质见仁见智,终无定论,原因之一就在于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中国多元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很难用一套适用于欧洲社会的模式来进行规范。秦汉以后,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奴隶制因素、地主制因素、自耕农经济成分和其他多种经济因素长期并存,而不表现为一种时间上先后的替代;自耕农、半自耕农经济的存在更是一种长期的现象,在每个新王朝的早期还往往占有很大的比重。此外,原始村社制的残余也普遍存在。而且,各种经济成分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总是处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动态变化之中。

二、多元的思想和制度文化

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必然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传统社会既有代表地主阶级的思想,也有反映农民平均主义、“劫富济贫”的社会观念;既有理性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的上层士大夫的精英文化,也有比较非理性

的下层大众文化。一方面,中国长期以来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另一方面,文化的多元又使三教自成一统。而且,儒教、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社会的作用也是多元的。儒教长期被作为中央专制集权政治的理论基础,但其中也不乏“民为重,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甚至从中找到了进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活动的思想武器^①。道教长期被统治者所利用,许多神祇还得到皇帝的封赠;但农民阶级和流民无产者也利用其组织形式和思想内容发动反对统治阶级的起义。实际上,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标准都是多元的、充满矛盾的,但同时又表现为一定意义的和谐相融,这种相融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的主导意识,强调多元和谐、异质的协调与对立的消解,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圆融。其突出的是文化的多元调和,追求均衡与和谐以及多层次系统的和谐(自然、人、社会的整体和谐)是中国古代文化无论大传统或小传统所共通的价值核心所在。^②就儒、释、道三教而言,尽管未能合一,但儒家重在人和,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道家重在天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佛家重在心和,强调心身和谐。三教并立而行,但又“和声”相通,互补互动,相得益彰。

从政治文化意义上说,“和”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更是一种社会秩序。而且由“和”而发,要求用“礼”的手段,实现“和”的社会秩序,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即通过传统的文化及至政治制度形式的“礼”,表达出中国社会中国人尤其是统治阶级对于“和”的追求理想和工具理性。

三、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路径选择

从十六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这些变化却是异常艰难与复杂的。^③

至康雍乾时期,新的生产方式的因素重新出现,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最后终于未能在中国自发建立。这主要受到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① 参见耿云志等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② 参见李亦圆:《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148页。

③ 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可以参见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傅衣凌:《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史学集刊》1982年第1期等。

的制约。就内因而言,多元的传统社会结构依然顽强存在,并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几千年来农民战争所主张的“平均主义”、“劫富济贫”思想在基层社会中一直是许多人追求的社会理想,资本原始积累所需要的社会心理环境很难出现。商业资本无法和欧洲一样转变为产业资本,商人们投资于钱庄、当铺、高利贷、票号等行业,通过买地成为地主,国家政权和乡族力量互相依存,互相勾结,不能代言资产阶级,从而实现社会变革。同时,清代中央专制集权空前加强,限制人民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错过了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轨的有利时机”,“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近世前期三百年的历史时,不由不为之扼腕痛惜!明清专制政权在历史必须转轨时,却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和抑商政策,在中国的周围设置了一道牢固的堤墙,阻挡着滔滔而来的世界文明。本来,历史的进展是十分复杂的,充满着可变性与多种选择的机会,而闭关政策的实施,却使中国商人在本来占优势的海外贸易中失去了竞争力,他们在南洋开拓的许多贸易基地被西方人夺去,这对中国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①这种决定性影响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终究未能在中国自发产生。

就外因而言,当时西欧已进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其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中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全球的扩张,终于导致了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卷入了该体系之中,确定了中国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弱小和不发达地位。在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下,中国的历史进程也随之改变。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世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使这个封闭的近乎停滞的东方大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正如马克思所说:“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②正由于内外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中国开始了新的社会演变进程。在这一新的社会演变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并未有根本改变,相反的,它很好地适应了变化了

①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41、24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91 页。

的社会环境,表现了很强的生命力,从而使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的演变具有更大的复杂性。

第二节 中国协商政治形态缘起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列强侵略范围的日益扩大、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也发生了急剧的动荡和分化,出现了各种救亡图强的思想和行动,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不仅使旧有的政治派别和社会成分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且产生了新的政治派别和社会成分,并由此引起传统的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中西政治文明的交融,而且为中国现代政治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的发展仍可以在这渐渐远逝的变化中找到最初的基因和起点。

一、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鸦片战争前后,当林则徐等人刚刚接触西方知识的时候,他们只是从最方便得到的一些西方人载记中略窥西方政治制度的大概情形。他们首先发现的是西方国家有议会,国有大事,可以协赞君主做出决定。后来出使人员根据直接的观察,逐渐形成君民共主的观念。不过其后国内出现的一批改革思想家对西方制度的认识并无重大突破,他们的贡献在于他们表达出改革政治的主张,形成改革的舆论,为维新运动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条件。

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及其主要追随者梁启超、谭嗣同等,开始用他们所得的西学知识,加上中国传统固有的儒学与佛学中潜涵的自由平等意识,建构他们的民权理论。他们的贡献是明确提出民权的观念和确立君主立宪的目标。而这时期,有深厚西学背景的严复,则独立地从译介西方民主经典入手,宣传民主自由的思想。他概括出中西之别在“自由不自由异尔”,他还把自由解释为“存我”^①。显然,严复代表了那

^① 耿云志等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个时期中国人对西方民主认识的水平。

戊戌变法失败后,直到辛亥革命爆发,这是中国人认识西方民主非常重要的时期。特别是1902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迅速增多,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有系统地宣传西方政治学说,而以新民为主旨。梁氏的“新民说”对自由与个人权利思想做了相当充分的阐释与发挥^①。而邹容的《革命军》虽总体上说是“反满最激烈之言论”,但其中于人民的自由权利亦有明确的主张,特别是提出未来的中华共和国一切仿照美国的制度^②。这个时期,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战涉及民主制度的许多基本问题。为了辩论的需要,双方都不能不认真研读一些关于西方民主以及国家制度的重要论著。尽管双方各有片面性,但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已有相当深入的认识,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理论系统。孙中山关于建立民主宪政分三步过渡的思想,以及他的五权宪法思想,是极具特色的民主理论。而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关于未来国会制度与责任政府的构想,表明他们对未来中国民主制度的建设也有了自己略成系统的思想。总之,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最基本的内容,如人民权利、政府权力制衡、选举、地方自治等等,都有较前更为深入的认识,而且对于在中国如何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问题也有相当深入的思考。后来,辛亥革命发生,清政府垮台,民国创建,人们即主要依据这个时期所积累的知识 and 经验构建起共和国最初的民主制度。

二、中国协商政治形态缘起

伴随西方民主理论的传播,中国社会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变革运动。从洋务运动的自强新政、戊戌维新的救亡图存到清末新政的王朝自救,清王朝统治阶级以极其复杂的心态进行着自觉和不自觉的政治社会改革。在清末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中,清政府逐渐调整和改造了相沿已久的“祖制”,并不自觉地朝着近代化的建制迈进。它虽然没有超出戊戌维新的社会政治蓝图,但它由“师夷”走向“变法”,由“变器”走向“变道”。它并没有完成向以“三权分立”为核

^① 参见耿云志等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第58—62页。

^② 参见耿云志等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第71—74页。

心的近代西方政治体制的转变,但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设置,如资政院、谘议局,却是封建政体的异军,是中国近代政治新陈代谢的一个重要环节。资政院、谘议局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过程中,一种重要政治形态——中国协商政治形态发生的逻辑起点。而这种政治形态的发生,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各种内外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初步成长。传统多元社会结构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虽然未能自然成长,但在 1840 年尤其是 1860 年代后,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资产阶级从旧的社会阶级形态中分化出来,初步成长为较完整的社会阶层。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主体部分是沿着两条途径形成的,一是突发型的“新途”,即地主、官僚、买办和商人通过投资近代工商企业,首先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发生较大的飞跃,成为资本家(往往还兼有其他社会身份),然后逐渐减少同旧的经济关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经济、政治、思想意识、心理特征及至生活方式朝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过渡。这是截然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形成的路径,同时也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发生的最主要路径。二是非突发式的渐变型的道路,这是一条类似于西方早期资产阶级形成过程的“古道”。作为新旧社会势力渗透融合、化生的产物,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中与近代经济相联系的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逐渐开始向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转化;另一方面,这种转化过程又远未完成,以至其内部结构呈现出迷离混乱、亦此亦彼的特点。在其内部,既有封建性的国家资本主义,又有封建官僚所占有的私人资本主义;既有官僚资本的胚芽,又有买办资本的发展。因此,早期资产阶级给人的印象是,既顺应时代的潮流,热心投资近代企业,穿上了资本主义的新装,又同时在身后拖着一条或封建或买办的粗大尾巴。而且至清末,官商互渗成了十分明显的社会现象,这既是封建地主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相互妥协又相互利用的结果,又是近代中国特殊社会环境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比较和缓、折中并符合传统的阶级转化方式。^①正是由于这种交叉、共融的特性,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既具备着广泛社会基础和巨大能量,又软弱妥协;既有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的追求,又担忧皇权失

^① 参见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8—258 页。

落对自己的冲击。

其次是皇权危机日益加重。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旅顺爆发,中国朝野为之震动,立宪思潮勃然而兴。十年前的甲午战争,立宪的东洋岛国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中华帝国;十年后,立宪的日本又挫败了专制的沙皇俄国,所以时人认为“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①,社会舆论普遍以立宪战胜专制为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亦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廿祀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②。这种立宪舆论的骤兴,具有开导风气、启人心智的作用,而真正使宪政改革成为可能,则取决于三种政治革新力量的推动。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二是资产阶级立宪派,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官僚改革派”。这三种政治力量的形成,对于保守的清廷决策集团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立宪运动已对清朝政权构成致命的威胁。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拯救民族危亡为进行革命斗争的直接出发点,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前提,“因中国今日已为满洲人所据,而满清之政治腐败已极,遂至中国之国势亦危险已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非革命无以救重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也”^③。资产阶级立宪派则以西方宪政为榜样,以君主立宪政体为母本,寻求对传统皇权政体的根本变革。加之20世纪最初几年人民群众普遍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皇权危机日益加重。

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与外患,清廷决策者无论为自身权位计,还是为国家民族计,均不能再抱残守缺、坐以待毙,必须设法谋求补救之道。资政院、谏议局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政治制度设计。这种制度安排既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治诉求,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矛盾与冲突,更力求从制度

^① 侯宜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② 《宪政初纲》,《东方杂志》第三年临时增刊。

^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2页。

上保证皇权的永世延续,因为《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中国国体采行“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①。而“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②,设谘议局“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③。而且这种制度设计,尤其是资政院和谘议局运行机制的安排上,使政治变革在一定的社会秩序范围内展开,力求多重矛盾交织中的不同社会主体能够在设定的制度限度内相应互涵,各适其位,不仅有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而且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和合文化相契合的。可以这样讲,当时的制度设计者们是在考虑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对近代西方政治制度进行了中国式的建构^④,当然日本以“和魂洋才”的中介形式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示范,也是这种建构的重要因素^⑤,或许孙中山后来注意把西方的模式与中国的传统因素相结合,创造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度和贤明高效政府的模式^⑥,也是这种中国式政治发展思路的体现。

三、中国协商政治形态演变

资政院、谘议局产生后的近百年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一种以资政院、谘议局为逻辑起点的协商政治形态始终存在,其中的典型形态有国民参政会、旧政治协商会议、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制度。尽管由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政治内容等有很大的差别,但其运行的基本方式却相当一致;尽管从发生学意义上看,中国协商政治包含着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因素,但其与当代西方协商政治产生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政治内容差别很大,政治效力也差异很大;尽管当代西方协商政

①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页。

②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06页。

③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670页。

④ 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53页。

⑤ 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9页;《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26—27页。

⑥ 参见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

治形态为我们分析和研究中国协商政治形态提供了比较和观照的对象，但搞清中国协商政治形态自身的演变规律，却是对当今中国政治发展更具价值的现实课题。